

# 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 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

刘 涛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通过对1938-2007年西方1041篇关于环境传播的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同时借鉴安德鲁·皮尔森特等学者的“关键词建构理论”，环境传播可以划分为九大研究领域：（1）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2）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3）媒介与环境新闻（4）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5）社会动员与环境话语营销（6）环境危机传播与管理（7）流行文化中的环境表征（8）环境与国际政治外交转型（9）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同时，立足于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本文从话语、权力与政治三个内在关联的视角具体解读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

**【关键词】**环境传播；环境话语；环境场域；环境公平；象征权力；环境政治；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随着《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学刊》《环境传播年刊》等学术期刊的里程碑式问世，以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北方亚利桑那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学术机构对于环境传播学科专业和研究项目的持续投入（Pleasant et al., 2002, p. 197），再加上四大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学会ICA、IAMCR、AEJMC、NCA都开辟了关于环境传播的主题分场<sup>[1]</sup>，环境传播已经成为应用传播学科门类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支学科（Cox, 2007; Schwarze, 2007）。然而，一个不得不说的遗憾是，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却始终未能引起国内学者“应有的”重视。

## 环境传播的概念辨析与历史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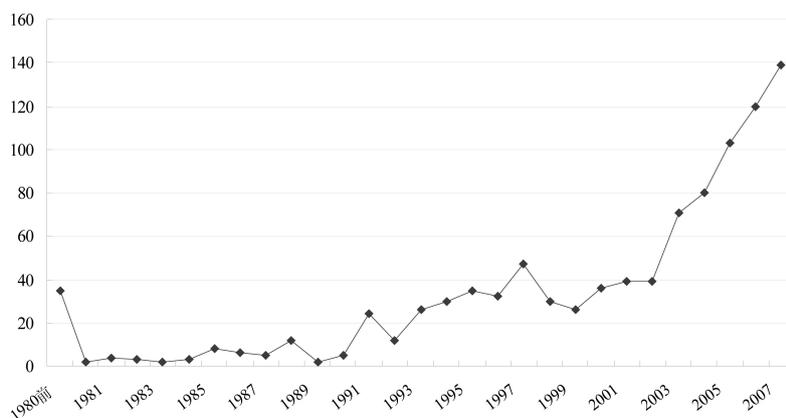
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Luhmann, 1989）年最早提出环境传播这一概念，他在其经典的著作《环境传播》中对环境传播的界定是：“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P. 28）。显然，卢曼从认知论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将环境危机（Environmental Danger）定位为“社会”与“自然”产生深度关联或裂变的中间纽带，因

**【作者简介】** 刘涛（1981-），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田纳西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西北师范大学影视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此，环境传播核心要探讨的是联结环境安全与社会变革的符号解释行为和话语建构行为。与此同时，学者迈尔森和里丁（Myserson & Rydin, 1991）从参与主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出发挖掘“环境”之外的构成元素——公民与社区组织、环保组织、科技专家、企业及其商业公关、反环保主义组织、媒介与环境新闻。因此，通过研究六种社会声音所搭建的网状结构背后的话语关系和传播关系，可以进一步认识环境传播的内在特性。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罗伯特·考克斯（Cox, 2006）在其最新著作《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中将环境传播界定为：“环境传播是一套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接受与认知，以及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主义驱动模式（Pragmatic Vehicle）和建构主义驱动模式（Constitutive Vehicle）”（P.12）。就实用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旨在探索种种涉及环境议题和公共辩论的信息封装、传递、接受与反馈；就建构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强调借助特定的叙述、话语和修辞等表达方式，进一步表征或者建构环境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政治命题、文化命题和哲学命题。随后，罗伯特·考克斯针对“环境传播是否应该承载构建社会共同体、维护良性生态系统的责任”这一伦理命题，进一步指出“环境传播是旨在构建良性环境系统和培育健康伦理观念的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s）”（Cox, 2007, P.6）。也就是说，环境传播可以在环境危机管理与传播领域“大做文章”，进而有效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学科定位，这一论述与卢曼的观点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纵观近50年来的环境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沉寂春天事件”，到70年代的“拉夫运河事件”，再到80年代的“环境正义事件”，后来到90年代的“绿色政党事件”，最后到21世纪的“生态外交事件”，历经半个世纪的轮番锤炼，面对不断涌现的环境难题，环境传播总是在充满未知的时代脉搏中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积累自身的研究方法。为了在定量的基础上分析环境传播“曾经做过什么”以及“目前正在做什么”，笔者对国际传播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数据库——“传播与大众媒介合集”（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sup>[2]</sup>——进行关键词分析与内容分析。1938-2007年间，笔者共检索到有关环境传播的学术论文和书评1041篇，70年来有关环境传播的研究文献数量在时间维度上呈显著上升趋势（均质差异性检验 $P=0.000$ ）（见表1），尤其是进入21世纪，环境传播研究文献以每年14.6篇的增长速度持续上升（从2001年的39篇到2007年的139篇），毋庸置疑，环境传播已经成为传播学领域非常年轻的“论剑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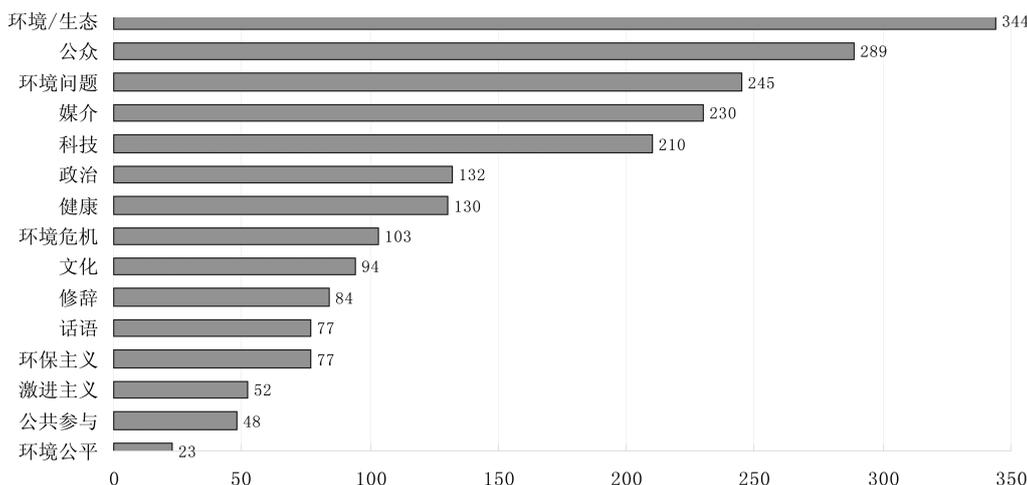
表1：环境传播论文文献数量统计（1938-2007）



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1041篇学术文章究竟在研究什么？借鉴安德鲁·皮尔森特等学者（Pleasant et al., 2002）在内容研究上采纳的“关键词建构理论”，即首先统计出一个学科运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然后以此为结点搭建出整个研究领域的网状框架，通过研究各个结点（或多重结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实践关系来具体地把握这个学术空间。笔者对这1041篇论文逐一进行了关键词统计和分析（见表2），论文中涉及到的频率最高的15个关键词依次是：环

境/生态、公众、环境问题、媒介、科技、政治、健康、环境危机、文化、修辞、话语、环保主义、激进主义、公共参与、环境公平。这15个关键词基本勾勒出环境传播研究的基本图景，也就是说，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旨在探索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多重关系，具体地可以划分为以下九大领域：（1）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2）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3）媒介与环境新闻（4）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5）社会动员与环境话语营销（6）环境危机传播与管理（7）流行文化中的环境表征（8）环境与国际政治外交转型（9）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

表2：环境传播论文文献关键词统计（1938-2007）



## 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

毋庸置疑，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学术版图和思辨空间，笔者主要从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出发，旨在从话语、权力与政治三个维度分别解读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都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相对而言，文化唯物主义主要揭示主导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渗透机制，而新历史主义则更加强调文本对权力与话语的体现以及权力和话语是如何发挥其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涉及到的“文本”，既包括可以进行量化统计和定性分析的新闻媒介报道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包括环境传播中影响深远的视觉事件和环境运动。

### 1、解释隐性的权力：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

话语(Discourse)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即一套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福柯认为，话语往往是与知识和权力绑定在一起的，话语把人类建构成主体，同时又消解人的主体性，进而又使人类“屈服”于主导知识体系或意识形态的规训。就环境传播而言，不同的环境话语意味着由不同知识体系所搭建起来的“环境观”，比如工具理性主义环境观认为一切环境矛盾最终都可以借助工业的力量予以解决，任何以保护生态为由而拒绝“工业步伐”的行为本质上都属于“生态恐怖主义”；而绿色政治环境观认为唯有通过改变政体架构的“革命途径”，才能从根本上以“政治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经由这样的政治建构与学术建构，不同的环境话语都以一种排他的方式去规约“环境”的涵义，进而以某种模式化的想象与规格作为典范，对异己的声音做出修正，以保持自身的完整性。学者约翰·德莱泽克(Dryzek, 2005)在《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一书中提出环境话语的九种类型：（1）生

存第一主义(2)普罗米修斯主义(3)行政理性主义,(4)民主实用主义(5)经济理性主义,(6)可持续发展观(7)生态现代主义(8)绿色激进主义(9)绿色政治观。与话语研究相对的一个命题是环境传播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研究,即通过抗拒主流环境话语的方式,从主流的文本与话语中寻找其矛盾与冲突,利用重新解读或者解构的方式,把被压抑或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体或环境理念重新加以放大和阐释,进而形成一种对抗性的话语体系。比如学者坎特和马斯卢克(Cantrill & Masluk, 1996)从底层“身份”、“权利”与“距离”的角度出发,开创性地探索环境反话语视野中的“草根政治”理念。

## 2、追求象征的力量: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

哲学家苏珊·朗格在《一个核心的哲学》一书中认为人是依靠象征而生活的动物,而修辞(Rhetoric)则是借助象征的手段去发现事物缺失状态下(指涉对象不在场)的意义,进而以一种“象征的力量”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当社会运作中的权力网络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游戏结构时,语言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象征性权力,一个社会的阶级就是通过对修辞或者象征的占有、控制以及不断创新而不断加固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辞与话语在权力想象与构成方面是不可分割的。通过跟踪百年环境话语流变中有关“平衡”(Patterson & Lee, 1997)、“安全”(Wolfe, 2007)、“健康”(Higgins et al., 2006)、“温室效应”(Livesey, 2002)等关键词的象征性表达,我们发现不同时期、不同权力阶层是如何借助对言语或行为的修辞而获得某种乔装打扮的支配力量,进而有效地发起一场“意识深处的修辞运动”,也就是西蒙斯、格瑞菲、迈克吉、卡斯卡特等社会学家所强调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新社会运动的显著标志并非直接产生了某种客体现象,而是那种表征现实和解释现实的修辞策略和言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Cathcart, 1983, P. 70)。因此,环境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新社会运动,根本上取决于修辞这把暗中驱动的双桨:“实用主义驱动机制”和“建构主义驱动机制”(Cox, 2006, P. 54),并最终演化为一场场阐释“修辞与权力”的文化运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下社会深刻发生的变化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以一种视觉化的修辞方式去制造、传递并放大某种声音已经成为视觉文化时代最为直接的行动理念,当“绿色和平”(Green Peace)、“地球第一!”(Earth First!)等环保组织分别以“图片政治”(Image Politics)(Deluca, 1999)和“生态情景剧”(Environmental Melodrama)(Schwarze, 2006)这种批判性修辞策略参与环境政治学的“身体叙事”时<sup>[3]</sup>,环境传播不仅开创并演绎了“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这一全新的批判性修辞理念,同时也为传统修辞学理论的“视觉转向”做出了积极补充。

## 3、在经典与修正之间:媒介与环境新闻

探讨大众媒介是如何呈现环境议题以及如何对环境信息的架构(Framing)可以说是最接近原初意义上对于环境传播的理解。关于环境新闻的研究大多致力于探讨媒介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比如学者萨纳汉和麦克考曼斯(Shanahan & McComas, 1999)通过分析媒介话语中的“温室效应”,进而指出社会主义激进分子是如何以“温室效应”的名义来攻击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脆弱性和罪恶性。另外,面对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生态激进主义组织——“绿色和平”和“地球第一!”,笔者通过分析CBS晚间新闻的话语框架,发现CBS是如何在冷战语境下来颂扬“绿色和平”的激进行为,同时又是如何在工业语境下将“地球第一!”封装为“生态恐怖主义”(Eco-terrorism)。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环境传播实践一步一步地挑战并质疑经典传播学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笔者与本杰明·贝茨通过大量的实证与文献研究发现,传统的叙事架构理论(Narration Framing)、培养分析理论(Cultivation Analysis)、媒介依存理论(Media Dependence)、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知识鸿沟理论(Knowledge Gap)只有经过必要修正或完全修改后才能有效地解释环境传播中的种种现象,因此提出了五种“替

代性的” (Alternative) 传播学理论——另类媒介依存理论、另类培养分析理论、另类叙事架构理论、另类议程设置理论和另类知识鸿沟理论 (Liu & Bates, 2008)。另外, 近期关于环境新闻的研究开始转向“视觉政治”与“反话语政治”层面, 比如基于主流环境话语之外的“独立媒介场域”研究 (如www.indymedia.org); 基于在线公民新闻理论的“绿色公共领域”研究 (Delicath & Deluca, 2003); 基于后网络时代的“另类在线激进主义”研究 (Slawter, 2008); 基于反全球化生态运动的“街道狂欢节”研究 (Leclair, 1993) ……

#### 4、探寻底层的声音：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

环境议题的政治决策过程包括哪些参与主体呢? 学者约翰·德莱泽克 (Dryzek, 2005, P. 73) 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三种途径: 行政理性主义 (Administrative Rationalism)、民主实用主义 (Democratic Pragmatism) 和市场理性主义 (Economic Rationalism)。行政理性主义强调专家声音 (技术理性的视角) 在环境危机评估和决策中的主导地位, 民主实用主义强调底层声音 (文化理性的视角) 在环境议题决策中的积极作用, 市场理性主义强调借助完全化的市场机制 (如“污染权”的私有、专让与买卖) 来解决潜在的环境矛盾。不可否认, 长期以来学者的研究焦点大多围绕民主实用主义展开, 并且在“公共参与” (Public Participation) 和“环境民主” (Environmental Democracy) 两方面做出了理论性建构。比如学者诺顿·托德 (Todd, 2007) 借鉴安东尼·吉登斯的架构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 提出了环境传播中的公共参与模式——“结构-行为”理论, 并且在本体安全、社会系统、本体能力、结构二元性四方面阐释这一理论模型在环境决策中的适用性。毋庸置疑, 公共参与是一个政治学术语, 而环境传播不仅可以构建公共参与政治研究的实践土壤, 同时也可以成为助推公民社会步伐的引擎跳板——从环境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试验田。因为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安全, 而且是一个涉及公共健康的政治问题, 公众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并且积极地在政治决策中表达自己的声音, 才能有效地防止政党利益或商业话语控制下的单边游戏。显然, 基于公共健康与公共安全角度出发逐步培养并沉淀下来的环境意识, 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一种普泛意义上政治参与的公民意识, 这种正在成长着的公民意识又可以有效地解决由环境不公平所引发的诸多社会不公平: 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产业链不公平、阶层不公平、国际不公平。由此看来, 基于环境传播的公共参与不仅仅是环境民主的前提条件, 同时也是环境民主走向社会公平的必要选择, 而这正是环境传播对于“公平”的启发, 以及对于“社会公平”的启发。

#### 5、作为商品的公共情绪：社会动员与环境话语营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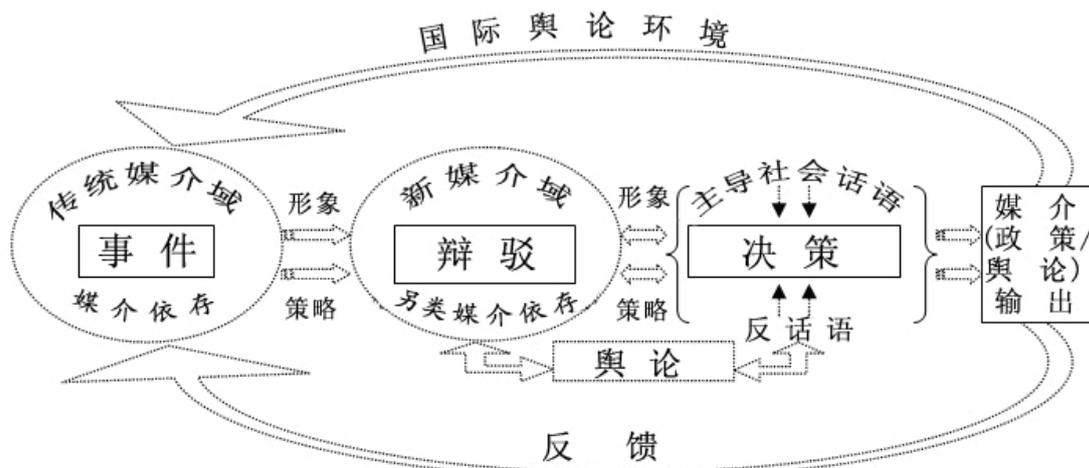
环境促进活动 (Environmental Advocacy Campaigns) 类似于经济学概念中的活动营销以及社会学范畴的社会动员, 强调借助媒体的传播力以及活动的影响力来汇聚公众的注意力、激发社会的公共情绪、影响集体的环境行为。学者罗伯特·考克斯 (Cox, 2006, P247) 从政治法律渠道、公共话语渠道和消费市场渠道出发提出了环境促进活动的九种模式: (1) 政治推介模式, (2) 法律诉讼模式, (3) 政治选举模式, (4) 公共教育模式, (5) 公民行动模式, (6) 媒介事件模式, (7) 社区宣传模式, (8) 绿色消费引导模式, (9) 企业抗议模式。正如前文所述, 批判性修辞同样蕴含着强大的话语力量——解释、质疑并挑战当前既定的环境行为、政治法规、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 这便引申出整合活动营销的概念。所谓环境传播的整合活动营销, 重点强调借助社会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学相关理论 (如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皮亚杰的“同化与顺应理论”、斯金纳的“重复强化理论”、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媒两极流动理论”等), 充分整合批判性修辞在意义表征层面的修辞权力、公共关系在活动组织层面的渠道优势、活动营销在系统架构层面的策划潜力, 进而积极有效地实现特定环境理念与环境行动的对象化传播效果。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环境整合营销活动案例是美国盐湖工程事件, 为了抗议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发电厂 (SRP项目), 祖尼部落借助种种言语修辞和身体修辞来打造“文化共同体理念”——“盐湖是我们的母亲, 祖尼人不能为了廉价的矿产献出母亲

的身体” (Cox, 2006, P. 268), 同时联合环保组织发起了一系列活动事件和媒介事件, 两年后SRP项目宣告失败。不得不提的是, 环境活动营销同样可以被商业组织用来推行自己的商业谋略, 学者斯坦伯和拉姆普顿在《剧毒废渣大有裨益: 谎言、鬼话以及公关工业》一书中借助大量的案例去阐释联邦政府与商业组织如何借助公关策略售卖公共情绪, 比如成功劝服农民高价购买剧毒工业废渣用作农田肥料 (Stauber & Rampton, 2002)。由此看来, 环境促进活动实际上逐步变为各个玩家抢占公众资源的社会游戏, 这场话语游戏背后的舆论与事件、玩家与玩法、以及玩家之间的微妙与暧昧, 都构成了环境活动营销的主要内容。

### 6、技术理性, 抑或文化理性: 环境危机传播与管理

环境危机传播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政府、企业或个人在遭遇名誉受损等环境危机事件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自救行为, 第二是媒体在面临危及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时所采取的信息传播方式。由于涉及到危机诱因的责任问题, 环境危机传播强调立足于传统的危机传播理论——辩解理论、形象修复理论、决策理论、创新扩散理论——以及相关的公关理论——如基于卓越理论 (Excellence Theory) 的四种公共关系结构模型: 媒介代理与公开模型、公共信息模型、双向异步模型、双向同步模型 (Grunig & Grunig, 1992), 进而有效地消除影响、恢复形象。而站在公众与媒体的角度而言, 危机如何定义、由谁来定义? 学者詹妮弗·汉密尔顿 (Hamilton, 2003) 的实证研究发现, 公众对于环境危机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文化理性 (Cultural Rationality), 而非技术专家所倡导的技术理性 (Technical Rationality)。居民如何才能从自身的遭遇和体验中读懂那些生涩的专业术语和化学公式? 学者费奥瑞诺 (Fiorino, 1989, P. 293) 将“公民社会中关于危机界定和分析的民主观念与权威专业机构的技术理性和行政部门的决策机制有效地连接起来”, 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文化理性的整合危机传播模式。另外, 笔者与本杰明·贝茨 (Liu & Bates, 2008) 借助大量的案例分析探讨“非常时期”的危机传播模式, 当某些突发性环境灾难降临是, 无论是集权政府对于媒介的直接控制, 或者是西方商业巨头对于媒介的商业操控, 公众往往无法从主流媒介获取有效的信息, 此时公众由“媒介依存”转向了“另类媒介依存”——借助修辞策略制造媒介事件, 运用新媒体动员群体力量, 发起舆论浪潮抗击主流话语, 借助国际舆论促使“反话语”空间生成, 进而为传统媒体的再次深度介入寻找必要的舆论保护和政治安全, 而这正是笔者和贝茨提出的基于“另类媒介依存理论”的环境危机传播模式 (Ibid. Table 3) (见表3)。

表3: 基于“另类媒介依存理论”的环境危机传播模式



## 7、环境速写，抑或另类公共领域：大众流行文化中的环境表征

学者罗伯特·考克斯在其《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一书中将“主流媒介对环境议题的符号化传播行为所引发或建构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辩论称为环境传播的公共领域”（Cox, 2006, P. 14）。20世纪80年代，为了抗拒主流媒体对于核工业前景的呼唤与渲染，德国和英国纷纷出现了一批“反核工业”的另类媒体声音，约翰·道宁（Downing, 1988）将这种“另类”的声音所建构的特殊空间和特殊认同称为“另类公共领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与此同时，当大众流行文化以不同的文体方式诠释“这个世界”（The World）并制造“另一个世界”（A World）时，环境，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表达议题。一方面，为了在主流商业媒体“杂乱”的喧哗中开辟出一个相对特殊的公共空间，环保组织或其它组织纷纷试图借助电影、音乐、贺卡、摄影、游戏和小说等流行文化形态来放大某种声音，进而在特定的受众群体中寻求某种公共认同，或者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探寻某种“象征利润”<sup>[4]</sup>。另一方面，由于流行文化对于自身场域的表征与修复建立在消费主义和欲望修辞之上，大众流行文化中的环境速写在消解意识形态的深度之际，又在其表象之下推行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共生的意识形态。学者马克·麦斯特和菲利斯·J. 詹普（Meister & Japp, 2003）在《生态大众：环境修辞与流行文化》一书中相信分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无缝植入到电影、游戏、广告等大众流行文化中，又是如何借助无坚不摧的商业神话建构公众对于环境的“固定认知”，以及续写这一神话的商业规则又是如何在场域结构的消费变迁和欲望修辞的自我修复中实现新自由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 8、在哲学与伦理之间：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思潮

关于人、自然与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面对生态危机时人类应该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定位，这便涉及到环境哲学的研究范畴。迈克·E. 齐默曼等学者（Zimmerman et al., 2004）在论文集《环境哲学：从动物权利到激进生态》中系统阐述了近代有关环境哲学争论与反思的三个主要维度：基于西方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动物解放运动的“生命中心主义”、以及基于土地伦理的“生态中心主义”。随着社会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的介入，环境哲学最终演变不同的生态批评思潮，以及不同文化视角观照下的环境伦理运动——深度生态主义（Deep Ecologism）、社会生态主义（Social Ecologism）、政治生态主义（Political Ecolog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帝国主义（Eco-Imperialism）、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比如，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社会对于自然的控制与对女性的支配都是父权文化下的理性崇拜和男性偏见造成的，而女性是生态系统的天使，她们静美、柔弱的身份性格，以及哺育、繁衍的社会性格都和自然是相通的，因此，赋予自然更多的关爱与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是相通的，二者都可以矫正男性的傲慢与偏见。与此同时，学者瓦达纳·施瓦（Shiva, 2000）在后殖民语境下讨论生态女性主义，在施瓦看来，女性传统的社会认同往往建立在对于土地的依赖和耕作上，全球化技术的扩张（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生产技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与土地分离，这不仅割断了女性与土地的依存关系，同时也破坏了生命本身的多样性和圣洁性……

## 9、从环境场域到政治场域：环境与国际外交转型

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国，2001年美国单边撤出《京都协定》，面对国际舆论以及民间声音的群体抗议，“后京都协定”时期的美国外交策略发生了什么转变？2008年，北海道5000多名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人士集体抗议八国峰会的召开，当世界秩序与国际正义完全交由八个国家时，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殖民与帝国战略到底如何解释……种种迹象都表明，环境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环境本身，相反却变成了国际外交战略中一颗掷地有声的棋子，穿梭于星罗棋布之中，或暗度陈仓，或声东击西，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积累特定的政治资本。例如，笔者跟踪分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八年间所有关于北京奥运的报道（2000.1-2008.8），在所有涉及北京奥运的2307篇报道中，环境批评报道（537篇）和人权批评报道（663

篇)在叙述逻辑和修辞关系上呈现高度(相关系数 $R=1.41$ ,显著度水平 $P=.005$ )。由此可见,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并非以一种纯粹的、建设性的视角进行介入,相反,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和人权问题并列的外交批评策略和外交修辞策略。除了直接参与外交话语的建构和修辞,环境传播还间接参与外交表达——公共外交的延伸和象征利润的积累。具体而言,公共外交强调借助公众或媒体的社会行为来提升国家软实力,根据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民间参与网络的高效与否,以及制度环境的保障与否,都将直接影响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绿色行为,而这种由环境所建构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提升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同样,在环境场域中积累的象征资本往往带有不被识别的权力关系,比如美国副总统戈尔借助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绿色影响力”,再加上诺贝尔和平奖在公共场域中所赋予他的文化资本,不断积累了戈尔在政治角逐中的象征利润——公众对于戈尔的“政治满意度”从2002年的44%上升到2008年的53%(Pew Research Center, 2008)。由此可见,在“环境场域”(公共场域)中积累的信任与声誉可以无缝转化为“政治场域”(专业场域)中权力扩张的象征资本,而这正是当下多元范式和场域重叠生态下环境外交所潜藏的多元共赢现象。

## 结 语

以上分别论述了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而贯穿始终的三个解读元素则是:话语、权力与政治。具体而言,六种彼此独立而又暧昧的参与主体,十五个相互作用而又依存的关键词结点,共同构成了环境传播研究视野中错综复杂的话语关系和意义网络。在约翰·斯道雷看来,任何有关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其背后都蕴含着话语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因此,笔者将环境传播的内涵进一步概括为:从环境“信息”到环境“意义”的符号化表征行为与象征性建构行为。这里的“意义”不仅取决于“文本”层面的实用主义传播理念,同时也取决于“语境”层面的象征权力理念;这里的“意义”不仅致力于规约“环境场域”的种种传播结构和传播关系,同时也致力于在“知识、修辞与话语”的权力谱系中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使现实合法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学者的研究热情和研究成果而言(见表1),环境传播研究已经步入佳境,但似乎又才刚刚起步,一方面,就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而言,环境传播曾经做过什么?目前正在做什么?未来可能做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梳理和探索必将成为环境传播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就环境传播的研究方法而言,除了基于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分析视角外,如何能够从环境科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理论中吸取多元化的批评武器或分析手段,这同样成为环境传播研究急需思考的命题。

### 注释:

- [1] 国际传播研究学会(IAMCR)和全美传播学会(NCA)分别开始了针对环境传播的主题分场,而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虽然并未开设关于环境传播的专门分组,但在“科技传播”与“健康传播”主题分场中均接受有关环境传播的论文。
- [2] “传播与大众媒介数据库合集”(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主要包括CommSearch数据库和Mass Media Articles Index数据库。共收录全球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795种学术期刊(截止到2008年8月)。
- [3] “地球第一!”环保组织借助对身体的极端折磨来传递“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如将自己的脖子套锁在千年古树上以抗拒伐木锯齿的逼近,将自己孱弱的身体埋藏在深土中以抗拒工业车轮的前进。
- [4] 依照布尔迪厄的理论,文化场域是指每一种特定内涵的文化都有其适用的界域,相应地,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正统”文化与处于边缘位置的“异端”文化之间的争论便构成了文化场域变化的辩证法,这便为游走于不同场域之间的象征利润的出现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象征利润强调在文化场域中所积累起的权望与名誉,这种象征资本并不是以某种经济利益为评判标准,而是强调在与经济资本的对抗中建构某种学术的、艺术的、文化的“利益”和“身份”。

(下转第82页)

也都是实打实的热点选题。虽然因为十二套的平台原因，该节目始终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但他们的生存，是不是也能给新闻频道一些鼓舞？试，也许就能试出新路，不试，就永远什么都不会有。如果我们乐观地估计，现在的舆论环境，已经有了在新闻频道再次开办辩论性节目的适度空间。只要把握得好，这样的节目不但能生存，还有可能取得成功。

说到底，在央视作评论，需要技巧、智慧，更需要的是勇气！

（上接第104页）

参考文献：

- [1]Cantrill, J. G., & Masluk, M. D. (1996). Place and privilege as predictors of how the environment is described i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Reports*, 9(1), 79-84.
- [2]Cathcart, R. S. (1983). A confrontation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4(1), 69-73.
- [3]Cox, R. (2006).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 London: Sage.
- [4]Cox, R. (2007). 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 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 1(1), 5-20.
- [5]Delicath, J. W., & Deluca, K. M. (2003). Image Events, the public sphere, and argumentative practice: The cas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 groups. *Argumentation*, 17(3), 315-333.
- [6]Deluca, K. M. (1999).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ahwah, NJ: The Guilford Press.
- [7]Downing, J. (1988). The alternative public realm: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1980s anti-nuclear press in West Germany and Britai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0(2), 163-181.
- [8]Dryzek, J. S. (2005).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Fiorino, D. J. (1989). Technical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risk analysis. *Risk Analysis*, 9(3), 293-299.
- [10]Grunig, J., & Grunig, L. (1992). "Models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in J. Grunig (Ed.), *Excellence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pp.285-325).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11]Hamilton, J. D. (2003). Exploring technical and cultural appeals in strategic risk communication: The fernald radium case. *Risk Analysis*, 23(2), 291-302.
- [12]Higgins, J., Naylor, P. J., Berry, T., O'Connor, B., & McLean, D. (2006). The health buck stops where? Thematic framing of health discourse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for CVD preventio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1(3), 343-358.
- [13]Kovel, J., & Lowy, M. (2002). 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31(1), 1-2 and 155-7.
- [14]Leclair, L. (1993). Carnivals against capital: Rooted in resistance. In A. Opel & E. Pompper (Eds.), *Representing resistance: Media,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pp. 3-15). Westport, CT: Praeger.
- [15]Liu, T., & Bates, B. J. (2008). From political risk to grass-roots enlightenment: Fostering civil consciousness through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 Stockholm, Sweden, July 21-25.
- [16]Livesey, S. M. (2002). Global warming wars: Rhetorical and discourse analytic approaches to ExxonMobil's corporate public discours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39(1), 117-148.
- [17]Luhmann, N. (1989).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J. Bednarz,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8]Meister, M., & Japp, P. M. (2002). *Enviropop: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rhetoric and popular culture*. Westport: Greenwood.
- [19]Myserson, G., & Rydin, Y. (1991). *The language of environment: A new rhetoric*.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 [20]Patterson, R., & Lee, R. (1997). The environmental rhetoric of "balance": A case study of regulatory discourse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public.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1), 25-40.
- [21]Pew Research Center. (2008). In the public eye: Who's up (Al Gore) and who's down (Oprah Winfrey). Retrieved Sep. 7, 2008, from <http://pewresearch.org/pubs/838/al-gore-oprah-winfrey>.
- [22]Pleasant, A., Good, J., Shanahan, J., & Cohen, B. (2002). The literatur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1(2), 197-205.
- [23]Schwarze, Steven. (2006). Environmental Melodram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2(3), 239-261.
- [24]Schwarze, Steven. (2007).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s a Discipline of Crisi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 1(1), 87-98.
- [25]Shanahan, J., & McComas, K. (1999). *Nature stories: Depic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ir effect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26]Shiva, V. (2000). Poverty and Globalisation. BBC Reith Lecture, Retrieved Sep. 12, 2008, from <http://www.converge.org.nz/pma/apvshiv.htm>.
- [27]Slawter, L. D. (2008). TreeHuggerTV: Re-Visualizing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the Post-Network era.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2), 212-228.
- [28]Stauber, J., & Rampton, S. (2002).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Lies, 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 [29]Todd, N. (2007). The Structur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rganizing environmental control.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1(2), 146-170.
- [30]Wolfe, D. P. (2007). Sidestepping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y through a rhetoric of Security: George W. Bush in Summerhaven, Arizona.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1(1), 28-48.
- [31]Zimmerman, M. E., Callicott, J. B., Clark, J., Warren, K. J., & Klaver I. J. (2004).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